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历史

纪念版

思想自由史

[英] J. B. 伯里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利本行历史

纪念版

思想自由史

[英] J. B. 伯里 著

周颖如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目 录

第一章	思想自由与反对的阻力(导言)	1
第二章	理性自由时代(古希腊罗马时期)	10
第三章	理性被禁锢(中世纪)	29
第四章	解脱的希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42
第五章	宗教宽容	56
第六章	理性主义的成长(17世纪与18世纪)	79
第七章	理性主义的前进(19世纪)	111
第八章	主张思想自由的理由	145



第一章 思想自由与反对的阻力

(导言)

常言道,思想是自由的。一个人只要不公开说出他所想的,他在心里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绝不会受到阻挠。只有经验和想像力的极限才会限制他的思想活动。但是这种独自私下思索的天赋自由权简直毫无价值。如不允许思考问题的人与他人交流思想,他本人会感到很不满足甚至很苦恼,而对于周围的人来说显然也没有什么价值。并且,要把已支配了一个人的头脑的思想隐藏起来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一个人思考的结果使他对那些制约周围人们行为的观念和习俗发生怀疑,反对他们所信奉的信仰,寻求改善他们所遵循的生活方式,如果他确信自己的推论是正确的,要他默不作声,或只偶或言之,或只泛泛而谈,而不暴露自己与众人思想不同之处,不同意他们的见解,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过去有一些人,像苏格拉底,宁死也不肯隐瞒他的思想,现在有些人也会这么做。因此,思想自由如有什么有价值的意义,应是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

在现今最文明的国家中,人们视言论自由是理所当然的,似乎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我们正习以为常,以致把言论自由视为天赋权利。但是这种权利是晚近才获得的,为争取到这一权利的道路血流成河。历经多少世纪才使那些最开通的人们相信,发表个人



意见和讨论各种问题的自由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过去人类社会(有几个显著例外的情况)一向都是反对思想自由的,换句话说,是反对新观念的,其原因不难看出。

一般人的头脑天生地懒于转动,并且倾向于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由一些他毫无怀疑地接受下来且坚信不疑的信仰组成。对于任何会打乱这个熟悉的世界的既定秩序的东西,他都本能地敌视。一种与他所持的某些信仰不相容的新观念,意味着需要重新调整他的思想;而这一过程是很费力的,需要耗费脑力,令人麻烦。对既定的信仰和制度提出怀疑的新观念和意见,在他和构成社会上大多数的同辈们看来是有害的,因为不合他们的意思。

仅因思想懒惰引起的反感由于一种现实的恐惧感而加深了。保守的天性顽固不化,成为保守的教条,认为社会结构的任何变更会危及社会基础。只是到了晚近年代,人们才放弃了那种认为一国的繁荣取决于固定不变的稳定性及其传统和制度保持不变的信念。凡是那种信念占上风的地方,标新立异的意见被认为既讨厌又危险,任何人如对公认的原则提出“为什么”和“何所根据”的令人为难的问题,就被视为危险人物。

保守的天性及由此而形成的保守的教条,由于迷信而加强了。如果说包括全部习俗和见解主张在内的社会结构是与宗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并被认为是受到神的庇护的,那么对社会秩序的批评就意味着不虔诚,而对宗教信仰的批评则是对超自然力量的天罚神谴的直接挑战了。

产生敌视新观念的保守精神的心理动机,由于社会中某些有

权势的阶层的强烈反对而增强了,诸如一个阶级、一个等级,或一个僧侣集团,他们的利益是与维持既定秩序和既定秩序赖以建立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

让我们设想一下,例如有一个民族相信日蚀是他们的神,为了向他们显示有用的消息这一特殊目的而使用的朕兆,可是一位聪明人发现了日蚀的真正原因。他的同胞们不喜欢他的发现,因为,第一,他们发现这很难与他们的其他观念调和一致;第二,这一发现打乱了他们认为最有利于他们的社会的秩序安排,使他们惶恐不安;最后,这冒犯了他们的神,使他们惊恐。那些以解释神兆为职责之一的僧侣们,对于这种危及他们的权力的理论,则感到惊慌和愤怒。

在史前时期,这些动机所产生的影响巨大,必定使在一些已进步的社会变革变缓,并且根本阻挠了一些社会进步。而在整个有史时期,这些动机继续在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妨碍人们认识事物和进步。甚至在现今最先进的社会中,这些动机虽已不再有力量去抑制发展或制止人们发表革命言论,我们仍可觉察到其作用。我们仍会遇到一种人,他讨厌新思想,认为这或许是危险的。那些对社会主义持反感态度的人,有多少人曾研究过赞成或反对的辩论?只因这种观点搅乱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并包含有对他们习以为常的行为秩序的激烈批评,便厌恶地表示不赞成。又有多少人会拒绝考虑改变我们不完善的婚姻制度的任何建议?只因这样的思想违犯了与宗教的教会法令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偏见。他们是对是错也未可知,但如果他们是错了,那也不能怪他们,因为这是受到那阻碍原始社会进步的同样动机的影响。处于现在自由的环境



中，周围的人总在期待新观念出现且犹感不足，尚且有那种精神境界的人存在，这倒使我们得以认识到，过去由这样一些人的观点形成公共舆论的时候，思想受到怎样的束缚，阻碍人们认知知识的阻力有多么巨大。

不顾权威、不顾他人的成见，自由发表个人对任何问题的意见，这在现在是一条牢牢确立的原则，但是我想过去只有少数人下决心宁死不屈为争取自由而战斗，才得以据理捍卫了思想的自由。我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言论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或者会以为这就足以反驳反对一方所能说的一切意见。但是我们很难看出这样一种权利是怎样才得以建立的。

如果说一个有某些“天赋权利”，维持生命的权利和生殖后代的权利肯定属于这一类。然而人类社会对其成员在行使这两种权利方面却施加了一些限制。一个饥饿的人是不许拿走属于其他人的食物的。男女乱交的生殖则为许多不同的法律和习俗所禁止。人们公认在限制这些基本权利方面，社会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限制，一个有序的社会就不复存在。因此，如果我们勉强承认发表意见也属于同一类权利，那就不可能据此力争，说这种天赋权利可以免受干涉，或说社会对言论自由的管制是不公道的。而这种让步未免太大了。因为在上述两种情况中，限制影响到每个人的行为，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只影响比较少数的人，他们有革命的或反对因袭旧说的意见要发表。事实是，关于言论自由属于天赋权利的观念并没有权利确凿有据的论证，因为这涉及到社会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站不住脚的理论。

另一方面，那些负责统治社会的人会争辩说，就和禁止任何反

社会行动一样,他们有责任禁止有害的言论流传。他们可以说,一个人宣传反社会的理论较之偷邻居的马或与邻居之妻通奸危害性大得多。他们要对国家的兴隆负责,如果他们确信某种言论是危险的,危及社会据以建立的政治的、宗教的或道德的信条,那就有责任保护社会免遭危险,像防止其他任何危险一样。

对这种限制思想自由的辩解的真正答复将在今后适当时候出现。这个问题远不是很显著明白的。要得出对言论的压制是错误的这一结论需要很长的时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只有一部分人确信这一点。就我个人的判断能力所及,这个结论是人类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这是权威与理性持续不断斗争的结果,也就是本书的主题。“权威”一词需要加一些说明。

如果你问某人怎么知道某事的,他会说:“我从可靠权威方面得知的。”或说:“我从一本书上看到的。”或说:“这是个常识的问题。”或说:“我从学校里学到的。”这些答复中不论哪一个的意思都是说他是从他人那里得到资料,相信他人的知识,而没有核实他们的话或是靠自己思考问题得出结论。大多数人的知识和信仰大都属于这一类,是从他们的父母、教师、熟人、书本、报纸上得来的,并未经过验证。当一个英国孩子学习法文,他是根据老师或文法书的权威才懂得动词变化和词的意义。地图上标出在某个地方,有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叫加尔各答,这一事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有根据的公认事实。历史上存在过拿破仑或是尤利乌斯·恺撒,也是公认的事实。常见的天文学事实论据,除了那些研究天文学的人之外,也是通过同样方法得知的。显然,如果我们不认为根据他人的权威接受许多事实是正确的,那么每个人的知识确实会



是很有限的。

不过我们认为正确的是有一个条件的。我们能够安然接受的事实必须是经得起论证或核实的事实。我上面列举的一些例子属于这一类。那个孩子要是去了法国或是能够读一本法文书,就能验证他得自权威的事实是真的。我天天都碰到很多事例证明,如果我不怕麻烦,我自己就能验证加尔各答的存在。我不能用这种方法弄清楚拿破仑的存在,不过要是对此有怀疑,一个简单的推理方法就表明:有大量的事实与认为他的不存在是不相容的。地球距离太阳约 9300 万英里,我对此没有怀疑,因为所有的天文学家都一致认为这是经过论证的,而他们的一致意见只是根据这一推测已经过论证才可以解释,如果我不怕麻烦去推算,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但是我们所有的知识并不都属于这一类。一般人的思想中不仅包含有可能核实的许多事实,也有许多信仰和意见是得自权威并且不能核实或证明的。信仰三位一体说是根据教会的权威,显然与相信加尔各答的存在的信仰属于不同体系。我们不能对这个权威性刨根问底,并要予以核实或证明。如果说我们接受这一教义,那是因为我们绝对信任权威才这么做,我们相信它的论断,尽管不能予以证明。

这种区别看来十分明显,简直不值得加以分辨。但是弄个一清二楚是很重要的。原始时代的人从他的先人那里得知,山里有熊,也有魔鬼,后来看到一只熊后,前一句话很快得到验证,但是他要是碰巧没有遇到魔鬼,除非他是个非凡的人,否则他不会想到这两句话之间是有区别的;如果他和人争论一个究竟,他倒会争辩

说,同族人关于熊的话既然是对的,那么关于魔鬼的话肯定也是对的。在中世纪,一个人根据权威既相信有一个叫君士坦丁堡的城市,也相信彗星是不祥之兆,象征神的愤怒,而不会去区分这两件事的证据性质有什么不同。现在我们有时仍会听到类乎这样的论点:既然我根据权威相信加尔各答的存在,难道我不能根据权威相信有魔鬼吗?

由于人们不论在什么时候总被命令、要求或请求只根据权威接受一些未经证实或不可能检验的教义,而权威就是指诸如公共舆论、教会或圣书等。大多数关于自然与人的信仰并非建立在科学的观察上,但直接或间接符合宗教和社会的利益,因而受到一种势力保护,这种势力防止那些有运用推理的不合时宜习惯的人的批评。没有人在意他的邻居不相信一件可以验证的事。要是有一个怀疑论者否认拿破仑存在过,或怀疑水的成分是氧和氢,不过是引起人们嘲笑或成为一个笑柄。然而要是他否定那些不能予以验证的教义,诸如存在一个人格化的上帝或灵魂不灭,那就要遭到严厉的指责,在一个时期还会被处死。我们的中世纪朋友要是怀疑君士坦丁堡的存在,只不过被人们称为傻子,但如果对彗星的意义提出质疑,那就会惹下大祸。要是他愚蠢到否认耶路撒冷的存在,那就逃不了人们的嘲笑了,因为《圣经》中就提到耶路撒冷。

在中世纪,各种信仰覆盖了很大的领域,权威宣称这些是真实的并把它们强加给人们,而理性受到告诫,不容立足。但是理性不能不忠于自己,它不能承认专横的禁令或壁垒。经验的整个领域就是理性的范围,其中各部分都是连结在一起并相互依存的;要理性承认它可能尚未涉足的任何领域,或放弃它的权利,交给一个其



资格尚未受到审查过并认可的权威,这都是不可能的。

按照定义,“理性主义”(rationalism)是指理性毫不妥协地维护它在整个思想领域的绝对权利。而至今仍附着于这个词上的轻蔑的诋毁,反映了理性与集结起来反对它的各种势力之间斗争的激烈。这一术语限用于神学领域,因为正是在这一领域,理性的自我断言遭到了最激烈、最顽强的反对。同样,拒绝思想受任何权威支配而只受自身支配的“自由思想”(free thought),也确切无疑地与神学相关联。在整个冲突过程中,权威一向占据优势。无论在什么时候,真正关注理性的人总是很少的少数人,在今后长时期里可能也会是这样。理性唯一的武器一向是论争。权威则使用了物质与精神上的暴力、法律上的高压手段和煽动社会不满等武器。有时它还企图利用它的敌手的武器,结果伤害了自己。实际上,权威一方战略形势上最弱的一点是,由于它的拥护者也是人,不禁也想用推理的方法,结果造成他们内部意见分歧。这给了理性可乘之机。可以说它在敌人阵营中发生影响,表面上服务于敌人的事业,实际上正在为夺取自己的胜利铺平道路。

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说,权威有一个由一些教义组成的正统领域,这些教义非人类经验所能理解,因此既不能加以证明或核实,同时也不能予以反证。当然,我们可以造出很多不能被反证为非的命题,可供某些极为虔诚的人去信仰;但是没有人会坚持说,只要这些教义的错误不实之处未得到证明,就应当完全相信。如果说其中只有一些是可信的,那么,除了理性之外,谁能做出判断呢?如果有人回答说,权威可以做出判断,那我们就碰到难题了,因为过去有许多得到权威支持的信仰,最终已被否定,并且被普遍




放弃了。不过仍有人说,除非能证明某一神学教义是错误的,否则我们似乎就没有理由反对它。但是证明的责任不在反对者一方。我记得有一次谈话,有人对于地狱说了些不敬的话,一位忠于地狱之说的朋友却得意洋洋地说,“尽管似乎很荒诞,你却不能反证其为非。”如果你听说,在围绕天狼星转的一个行星上有一群蠢驴,它们讲英语并以讨论优生学来消磨时间,你不能反证这话是荒谬的,但能因此就有权要求人们相信吗?如果这话为人们足够多地反复讲述,那么通过暗示的强有力的力量,有些人从思想上也会接受它。这种主要靠重复强调发挥的暗示力量(据研究,这就是现代广告的理论基础),对于建立权威性的意见和宣传宗教信条曾起了很大的作用。理性有幸也能利用这同一助力。

下文的概略叙述限于西方文明。从希腊开始,并试图简单叙述几个主要阶段。这仅仅是对一个庞大而错综复杂的论题作的最简略的概论。如果充分论述这个题目,那就不仅包含有关宗教、教会、异端和迫害的历史,而且也涉及哲学史、自然科学史和政治学说史。从16世纪到法国大革命,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与争取思想自由的斗争有关系。自从古代文明衰落以来,理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的一切趋向和相互影响,曾阻碍或帮助了理性的解放,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用毕生精力来思考,需要写出多部著作来阐述。本人现在所能做的,甚至在一本比本书篇幅要大得多的书中所能做的,只是简单陈述斗争的大体经过情况,并对作者碰巧曾专门研究过的某些特点方面作些详细的论述。



第二章 理性自由时代 (古希腊罗马时期)



如果有人要求我们详细说明文明受惠于古希腊人之处，我们很自然地首先想到他们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但是一个更正确的答复可能是：我们对希腊人的最深切的感激之情是由于他们是思想自由和辩论自由的创始者。因为这种精神上的自由不仅是他们在哲学上的思辨、科学上的进步、政治制度方面的实验的条件，也是他们在文学艺术领域创作出优秀作品的条件。例如，他们的文学如果被禁止有批评生活的自由，就绝不会达到那么美妙的境地。然而撇开他们实际上所取得的成就不谈，即使他们在人类活动的大多数领域没有做到已做出的了不起的贡献，他们坚持自由原则的主张就足以把他们置于最崇高的造福人类者的行列了：因为这是人类进步中最伟大的步骤之一。

我们对于希腊人最早时期历史的了解不足以解释他们怎么会获得自由的世界观，并从而具有对批评和好奇心的范围不加限制的意志和勇气。必须承认这一特点是一个事实。但是大家应当记住，希腊人是由许多个别的部族组成的，虽然具有一些共同的重要特征，但在气质、习俗和传统方面大不相同。有的部族较之其他部族守旧、落后，或不是那么富有才智。本章所谈的希腊人，不是指所有的希腊人，而只是指那些在文明史上最举足轻重的希腊人，特

别是爱奥尼亚人与雅典人。

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是自由思考的发祥地。欧洲的科学史和欧洲哲学史都起源于爱奥尼亚。正是在这里(公元前6—5世纪),古代的哲学家运用推理的方法,想深入探讨世界的起源和构造。当然,他们还不能使自己的思想完全摆脱公认的意见,但是已着手摧毁正统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工作。在这些思想先驱者中,应该特别提到色诺芬(尽管他不是最重要或最才华出众的人),因为人们对他的学说的宽容说明这些人生活在怎样的自由氛围中。他从一个城邦周游到另一个城邦,对民众关于诸神和诸女神的信仰的道德根据提出质疑,对希腊人已形成的把他们的神人格化的观念加以嘲笑。“如果牛有双手和人类的本领,它们也会按牛的模样塑造诸神。”对公认的神学的这种攻击,也是对古代一些诗人,特别是荷马史诗的真实性的攻击,当时人们认为荷马是神话方面的最高权威。色诺芬严厉地批评他,因为他把人类犯下的会被认为极不光彩的行为说成是神的行为。我们没有听说有任何人企图采取措施制止他这样攻击传统信仰并指斥荷马为宣扬不道德行为者的言行。我们必须记住,从没有人认为荷马式诗歌是上帝的话。曾有人说荷马史诗是希腊人的《圣经》。这话完全不对,不符合事理。希腊人幸而没有《圣经》,这一事实既是他们拥有自由的表现,也是他们拥有自由的重要条件。荷马的诗歌是世俗性的,不是宗教性的。我们还可注意到,较之人们可能提到的一些圣书,荷马诗歌较自由,不受不道德和野蛮残暴行为的影响。荷马史诗的权威极大;但是它不像一本圣书的权威一样具有约束力,所以批评荷马史诗从没有像批评《圣经》那样遭到阻挠。



在这一方面，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自由的另一个表现和条件；希腊不存在神圣人员有超自然力的教义（sacerdotalism，司铎天赋神权说），寺庙的僧侣从没有形成一个有势力的等级，可以为了一己的利益而对社会横行霸道，有能力压制人们发出反对宗教信仰的言论。行政当局把做公共礼拜的总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即使某些僧侣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势力，但我们一般说来实质上是国家公仆，除了在有关宗教仪式的技术细节方面外，他们的话无足轻重。

现在回过来谈谈古代哲学家，他们大多数是唯物主义者，有关他们思辨推理的记载是理性主义史上很有意义的一章。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伟大的名字，即赫拉克利特^①与德谟克利特^②，因为他们通过苦思冥想，或许较之其他任何人更使理性养成以新的方法来观察宇宙，并冲击常识中一些经不起推敲分析的观念。人们首次从赫拉克利特处获悉，呈现于我们感官的物质的东西恒久不变的现象是假象，宇宙及其中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这是令人十分惊讶的。德谟克利特所完成的惊人业绩在于提出宇宙原子论，这一学说在 17 世纪又被人重新提出来，在抽象思想史上是与物质的最现代的物理和化学理论相联系的。当时希腊没有神圣权威所强加于人的想入非非的创世说，来妨碍这些强有力的智者头脑思考问题。

①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约公元前 540—约前 480 年)，希腊哲学家，因其宇宙论而著名，认为宇宙处于永恒流动的过程中，万物是通过理性相互关联的。——译者

②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约公元前 460—约前 370 年)，希腊哲学家，在宇宙原子论的发展方面占重要地位。——译者